

习近平家语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心底无私，正确维护党中央权威，对来自中央领导同志家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违规干预、捞取好处等行为，对自称同中央领导同志有特殊关系的人提出的要求，不准擅自办理，必须坚决抵制并立即向党中央报告。古语说：“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于亲。”意思是不因为自己的亲人而危害国家，所以说国家比亲人还要亲。中央领导同志、中央委

员要带头反对特权，严格家风家教，为全党作出表率。我这里说一句，凡是社会上有人打着我的旗号求你们办事的，就凭这一条，首先就要让他们办不成！谁给他们办了，就是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我不仅不会感谢你，而且一定会追究责任！

《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

家视界

老年人失能给配偶带来了更大的精神压力，成为老年配偶精神健康水平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谁来守护失能老人
配偶照料者？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天红

正午暖阳和煦，正是好时光，邓香莲老人却觉得浑身乏力，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从吃过早饭后就一直坐在沙发上愣愣地出神。

2018年，邓香莲的老伴因患高血压导致半身不遂，自那时起，74岁的邓香莲老人便承担起照顾老伴的重任，重心都放在了老伴身上，喂饭、处理大小便、为老伴擦洗身子……常常老伴深夜的一声咳嗽就能把她惊醒。

“我觉得，我妈这种状态跟照顾我爸有关系，她的身体和精神压力都太大了。”儿子刘春晖说。他觉得母亲“不对劲”，带母亲到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结果母亲被诊断为轻度抑郁症。

失能老人配偶照料者的焦虑与担忧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生活中有很多照料失能老人的老人，有着和邓香莲一样难以言说的焦虑和担忧。

我国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当前约有失能、半失能老人4000万余人，占老年人口的18.3%；北京大学的一项人口学研究则预测，到2030年，我国失能老人规模将超过7700万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赵锐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现有数据测算，大约有六七成失能老人是由老年配偶参与照料的，虽然参与的程度有所不同。”

除了身体上的劳累，照顾失能老人还承受着很大的心理负荷。

北京市通州区河畔雅苑社区关胜利老人在老伴连续7年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伴儿。这两年，随着病情加重，老伴儿已经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前段时间，她还可以吃颗粒状的食物，现在她的吞咽咀嚼能力又下降了，只能吃糊状食物了，需要用破壁机搅碎了一勺勺喂给她，每天喂三次饭

两次药，相比之下，照顾她上厕所、洗澡成了大难题。”今年十一之前，家中的保姆回了老家，关胜利独自伺候了老伴11天，把腰累坏了。

老伴四肢已经不听使唤，从床上把她移到轮椅上要两个人五六分钟才能完成，是个“大工程”。这让失能老人出门就医成了大难事儿。“因为出行不便，她最近几年没去过医院，都是我到医院代她去开药。”关胜利说。

在不大的卧室里，关胜利将自己的单人床与老伴的病床头对头放在一起，以便照顾。常常，老伴儿晚上八九点钟睡了，但他迟迟不能入睡，“想到她的病，以及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就睡不着。我现在每天靠吃安眠药，才能维持6个小时的睡眠。”

在近期发表的《失能老人居家照料与配偶的生活质量》一文中，赵锐从精神健康的角度关注失能老人配偶的生活质量，这项基于9100名老年人的追踪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失能给配偶带来了更大的精神压力，成为老年配偶精神健康水平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武汉科技大学讲师周艺梦等人基于1012位照料失能配偶者的研究亦发现，44%的老年人配偶照料者有抑郁症状。

女性配偶照料者更易因经济压力而焦虑

失能老人配偶照料者的精神压力来源于多个方面，劳累、休息不足，对配偶病情恶化的担心，缺乏社交，自我价值感降低，缺乏照料病人的知识和技能等都会加剧失能老人配偶照料者的焦虑情绪。

家住山东省茌平县洪官屯镇的刘奶奶在老伴卧床后，常有一种难言的失落感。刘奶奶今年85岁了，三年前，老伴突发脑出血瘫痪在床。老伴瘫痪后，老两口常做些手工刺绣品拿到集市上卖。老伴瘫痪后，刘奶奶全职照料，没有了经济收入，老伴看病还要花钱，只能向孩子们伸手。刘

奶奶一向要强，虽然孩子们都很孝顺，但现在要靠孩子们给钱过日子，她感到非常不安。

老年生活地经济基础对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赵锐很关注养老金获得对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老年人失能时，配偶有资格领取职业养老金将会缓解对配偶精神健康的不利影响。如果老年人能够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而不单单依靠配偶的收入，那么即使配偶失能失去原有劳动收入，或者未来因配偶死亡失去可被分享的养老金，老年人的生活也能得到保障，其精神健康因配偶失能所受的影响能够被缓解。”他表示。

在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京贸国际城小区广场上，83岁的程清华老人浑身散发着热情与活力。11年前，老伴因糖尿病去世，“我有退休金，老伴之前也有退休金，去世前他卧床两年多，我一直照料，后来觉得压力太大，雇了保姆，分担了不少压力。”谈及曾经照料失能老伴的情况，程清华老人感到很释怀。

值得关注的是，在失能老人配偶照料中，存在很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老年人照顾老伴的情况更多。除了照料压力，由于女性老年人的经济状况通常低于男性老年人，她们还面临着更多由经济压力导致的焦虑。

“由于职场上存在的性别工资差距，女性老年人一般退休金比男性老年人低；更有很多女性老人在年轻时主要承担家庭照料工作，没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晚年没有退休金，经济上依赖配偶和子女，还有一种对于丧偶后自己没有收入的担心和忧虑，这也是部分失能老人配偶照料者的一个重要压力源。”华南农业大学李琴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李琴认为，“农村老年女性面临的挑战更多，在老伴失能后，她们更可能成为直接照料者；并且在老伴失能或丧偶后，农村老年女性常失去经济来源。”

社区助力家庭养老责任重

“叔叔，您今天中午要订什么餐呀？我们今天有三种套餐可以选择……”在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城和敬养老公司盛业家园驿站，站长吴丹正忙着为辖区内有需要的失能老人订午饭。

作为一个基层养老工作者，吴丹用“脚不沾地”来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她拿着厚厚一摞随访登记表告诉记者：“失能老人是我们社区养老驿站关注的重点对象。在我们站辖区内共有90名失能老人。我们每周要对他们逐一进行一次寻访，主要为他们提供政策宣讲、卫生清洁及护理，还有精神疏导等服务。”

吴丹对每个失能老人的情况都“门儿清”。“对于那些需要照顾失能老伴的老人来说，天天面对一个卧床的病人，确实会很压抑，我上门的时候就会跟他们聊家常，讲讲发生在身边的事儿，调节一下他们的心情。失能老人出行不便，看病就医是大难题。”吴丹说。

像吴丹这样的社区工作者正在社会化的基层养老服务中担当重任。“社区养老是缓解老年精神压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社区和村集体离家近，相比机构养老具有很大的便利性和灵活性，可以通过举办丰富多样的老年活动，增强老年人的融入感，缓解他们的精神压力。”李琴说。

通过社会化手段缓解失能老人照料者压力方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个很好的探索。目前，全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已覆盖49个城市，1.45亿人，累计172万人享受待遇，人均报销水平约达到每年1.6万元。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主要是解决失能老人购买社会服务的资金来源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老人人就可以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支付方式减轻自己的压力，这也将推动老年照料服务的进一步市场化，推动建立一个社会化养老服务的良性机制。”赵锐表示。

家庭工作创新案例调研行

“党员额吉”：用妈妈的爱温暖困境孩子的心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秋

蒙古语中，“额吉”意为妈妈。“自去年4月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党员额吉’帮帮团志愿服务行动至今一年半，已有3685名‘党员额吉’与3985名儿童结对，走访慰问520余次，发放慰问钱物34.7万元。除了钱物，我们更看重用心、用情，在精神层面为困境儿童多付出，涌现出一批党员好妈妈！”内蒙古通辽市妇联主席包红梅说。

“党员额吉”帮帮团由总队、大队、分队三级组成，市妇联负责组建总队，市直机关和每个旗县市区分别组建1支大队，在嘎查村、社区成立小队。截至目前，已组建大队10个、分队62个。据了解，市妇联机关13名“党员额吉”深入库伦旗三家子学校，与13名困境儿童结对，交换“爱心联系卡”，为留守儿童送去6000元文具。

树立正确三观比给钱物重要

科尔沁区红星街道的崔永红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小莹的情形，“家徒四壁，唯一的亮色，就是墙上小莹的奖状。她妈妈患严重的糖尿病和类风湿关节炎，娘儿俩靠低保维持生计。小莹看上去胆怯、敏感。”崔永红说。

崔永红主动承担了小莹的学习和生

活费用。她又联系当地超市，帮小莹妈妈安排了工作。她还经常让自己的孩子和小莹一起学习，寒暑假一同去图书馆、博物馆、游乐场，去草原看蒙古包，小莹敞开了心扉，脸上有了笑容，那个沉闷多年的家，也经常传出娘儿俩欢快的笑声。班主任老师欣喜地告诉她，小莹的成绩稳定上升且遥遥领先。更让崔永红欣慰的是，小莹主动和其他小朋友分享玩具、书籍。

崔永红认为，要让孩子在精神上得到爱、引领感召她树立正确的三观，让爱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有啥困难跟我说，我就是你妈妈

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党员额吉”贾秀妍去乡下得知小海的困境：15岁的小海两岁时没了母亲，父亲前年去世。贾秀妍为他申请到每月1880元的孤儿生活补助，以及孤儿救济款每月300元，又向学校争取了全免学费、食宿费。她告诉小海：“以后我就是你妈妈！一定要好好上学，有啥困难跟我说，我帮你解决！”她加入了小海班级的微信群，经常和老师沟通他的学习、生活情况。小海比从前自信了，成绩明显提高。近期，甘旗卡镇有疫情，小海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志愿者住，他也

穿上红马甲做抗疫志愿者。

据了解，甘旗卡镇的“党员额吉”用爱为32名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撑起了一片“晴空”。

最要紧的是打开孩子心结

今年5月，开鲁县委宣传部干部聂晓丽与县开鲁镇全胜村困境儿童小豪结对。

小豪爸爸告诉聂晓丽：“我和他妈离异四五年了，他妈走后孩子就不愿跟人交流，对我有怨气。我要干农活，离婚很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对孩子关心不够。”

聂晓丽想，最要紧的是打开孩子的心结。此后，每到双休日，聂晓丽就带上比小豪大一岁的儿子去看他，以大朋友的身份跟他聊天，了解他的想法。渐渐地，小豪消除了戒心，向聂晓丽吐露了心声：由于妈妈不在身边，自己被小伙伴瞧不起，他因此恨爸爸。聂晓丽语重心长告诉小豪，爸爸妈妈离婚了，可他们的爱永远不变。父母不适合在一起生活，离婚很正常。心结打开了，小豪不再跟爸爸赌气了，如今，还能帮爸爸做些家务了。

聂晓丽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每当看到他渴望被关爱的眼神，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摸摸他的头，拍拍他的肩，每一次爱抚对他都弥足珍贵，这是母爱的力量！”

引领更多人加入“党员额吉”

科左后旗人大常委选举主任、“党员额吉”图雅先后协调额勒勒中学、阿都沁中心校和幼儿园，减免了9名贫困生伙食费；协调旗扶贫促进会、旗关工委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市女企业家协会和科左后旗爱心企业家，为20多名留守困境儿童申请扶贫救助资金1.35万元。去年5月，图雅与阿都沁嘎查困境儿童小芽兄妹结对，送去4000元现金和价值3000多元衣物文具，协调学校减免了二人的伙食费。今年中考，小芽的哥哥考出了583.7的好成绩，图雅第一时间协助他填报志愿，进入了心仪的学校。

她还发动女人大代表参与志愿服务，组织机关女干部到阿都沁嘎查对接困境儿童。协调机关工会和红十字会，为31名留守儿童发放助学金每人1.55万元。今年3月8日，图雅联系58名市、旗两级女人大代表与全旗58名留守困境儿童结对，为她们送去生活学习用品，并组织部分驻旗市代表，到旗特殊教育学校为“特殊”孩子义诊、捐资捐物。

前不久，与之结对的阿都沁中心校四年级学生王赫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王赫非常感恩，将暑期捡蘑菇换来的999元捐赠给红十字会。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加强
家庭领域建设系列专家谈②

储朝晖

二十大报告重申“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使多年来在各地积极推进并写入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得到进一步重视。

“家校社协同育人”这一提法，近些年使用的频率很高，反映出它成为当下破解众多教育难题、提升教育品质的突破口。但不少人对它的理解还过于笼统、肤浅，在不少地方推进过程中或流于口号，或依然存在重重困难。如何深度、有效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为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家校社环境，助力未成成年人成才，仍然是待解的难题。

实际中遇到的困难主要有：首先，三方对协同育人的意愿强弱不同，常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其次，在具体的教育对象身上，协同的目标和内容上难以达成一致，家长的期望与学校的努力方向夹角太大，难以有效形成显著的合力；再次，怎样形成一个可以对具体的学生适用的家校社育人方案，在这三方中通常组织协调力较强的学校也无能为力、无计可施；难度更高的是建立机制，不少学校和机构只能一学期开展一次有家长和社区成员参与活动，难以形成常态的机制。

更有效解决家校社在育人上有效协同的问题，须得承认家庭、学校、社会或社区是三种不同质的社会组织存在，它们的性质、功能、结构、目标都存在差异，能够协同的基础是三方都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根据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物理学教授哈肯提出的协同理论：强调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不同组织或者个体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在过程中协调一致就能产生“1+1>2”的协同效应。

因此，在任何一个个体的学生个案上，实现协同的认识基础是他所处的家校社三方都认识到协同能够比不协同获得更好的收益和收益，因此自觉自愿地寻求与另外两方协同。只要其中一方，比如家庭或社区没有对此的充足认识，没有真诚的意愿就很难实现协同。现实中常遇到的情况是家庭认识不到位，社区或社会的主体淡化，以为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相关度低而不愿参与协同。为此，需要提高家庭认识，消除短视化、功利化观念，同时，改进社区的管理与评价才能奏效。

从系统视角看，教育系统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其内部又有许多有外在关联的子系统，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而是各自有各自的主体与边界的交叉关系。实现协同需要时间、空间、事件三要素同框，客观上在每个学生学习生活中必然存在上述三要素的同框，当三方未主观意识到的时候就难以产生有意义的教育效能。为此，提高家庭、学校、社区在育人上的有意交往，消除陌生人效应，才有利于家校社协同育人。

从协同过程上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协同就是家校社协同，家庭、学校、社会三者相对独立，有各自的责任与权利，需要在相互平等、尊重、关怀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协同。协同的方式不是统一行动听指挥，统一行动听指挥是在单一组织体系内的运行方式，不适合于三方协同，也不能简单搬到协同。协同学理论为三方协同育人提供了如何形成合力、保持动力、及时反馈、保障到位等问题的理论参考与指导。因此，不能指望一行政指令就实现协同。事实上，不少地方协同未能有效实现正是由于不少人行为方式未能转换，以为行政指令发出了就可以，不再继续向前推进了，使得文件成为未能有效实施的空文，家校社未能真正在育人上协同起来。

那么，协同的动力从何而来？来自每个个体内心爱的自然发挥和希望得到爱的需要。英国学者麦克菲尔基于人的爱的特性提出关怀理论，认为爱与被爱是人性的基本需要，帮人满足这一需要是教育的首要职责。进而提出以体谅为核心组织教育，帮助对象摆脱恐惧与怀疑，以培养学生给予和接受能力为中心，不仅要传授道德规则，更要培养态度，引导行为，提高解决问题能力。因此，家校社协同育人不能止于行政政策与法规的推动，而需要回归到发挥和满足人的内在天性需求。让每个人爱的天性得到自然滋养，就能够实现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意识境界；如果一部分人的爱未得到自然发育成长，即便安排了任务，提出了要求，也未必能在这样的人群中实现协同育人。而在一个天性的爱得到充分成长、发挥与满足的人群中，即便没有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外部要求，也能达到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境界。

在需要努力推进才能实现协同育人的人群中，关怀仍然是推进工作的出发点和方式、目标，并能切合人的基本需要。关怀理论的另一位倡导者尼尔诺丁斯认为：关怀是美德更是关系，平等互惠，需要建立、维持和增强。有了充足的关怀，甚至不需要有形的组织和机制，也能实现协同育人。

由此可见，深度有效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不能仅仅依靠或停留于重视与强调，而需要洞悉其内在的理论、规律，深入了解当下的实际问题与障碍，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寻找灵活多样的解决问题方案。具体的方案由具体的三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政府和相关机构注重创设好的条件和氛围。其中必备的条件：一是师生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家长与社区机构人员之间平等交流，相互尊重，消除等级观念；二是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互补；三是及时形成基于具体学生个体的共同成长目标，通过榜样、对话、实践、认可达到教育效果。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

家校社协同育人需向深度有效推进